

助长抑或抑制:武术教育对校园欺凌现象的多维审视

项春燕,朱 雄

(武汉体育学院武术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

[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维视角,审视武术教育在校园欺凌现象中的介入作用,并提出优化干预路径。研究认为,武术教育“以武育德”功能抑制校园欺凌现象滋生,但因兼具黠武风险易导致暴力行为泛化;武术教育为被欺凌者心理赋能,但对欺凌者具有双向引导作用;武术教育作为干预手段抑制校园欺凌行为,但群体排他性助长欺凌行为。最后提出实施德技并重的武术课程教学模式,强化受教育者自控能力;设计对抗与合作相结合的课堂教学情境,培育受教育者化解矛盾冲突智慧;打造个体与社群联动教育机制,重塑校园和谐文明生态等武术教育优化校园欺凌现象的干预路径。

[关键词]青少年;武术教育;校园欺凌;多维审视

[作者简介]项春燕(2001—),女,湖北黄冈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武术文化与价值观。通信作者:朱雄(1979—),男,湖北黄冈人,副教授,研究方向:武术文化与价值观。

[DOI] <https://doi.org/10.62662/kxwzz0207031>

[中图分类号] G85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jkw1966@163.com

近年来,校园欺凌事件频发,对涉事青少年身心造成极大创伤,给家庭、学校乃至整个社会带来诸多不良影响。2017年《中国校园欺凌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校园欺凌现状不容乐观,欺凌事件遍布全国,呈现低龄化、情节恶劣化趋势。2023年9月,山西省大同市未成年人恶性欺凌事件引发舆论热议。2024年3月,河北邯郸市肥乡区一初中生被三名同学欺凌并杀害的恶性事件,引起全社会对未成年人校园欺凌与犯罪的广泛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校园欺凌现象已严重干扰了正常的教育秩序,破坏了充满阳光活力的校园氛围,部分青少年甚至因长期遭受欺凌而产生厌学、抑郁等心理问题。与此同时,“冷漠旁观”“以暴制暴”等错误观念在部分青少年群体中悄然滋生,对他们道德认知与行为规范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亟待通过有效的教育手段予以干预纠正。

武术是中华民族瑰宝,因其蕴含着丰富的以文化人的教育内涵和多元的武以成人的教育价值,近代以来被纳入学校教育体系。学校武术蕴含的“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念,不仅是一项增强体质的体育运动,更是一种通过身体实践来塑造人格,通过道德教育培育品格的重要载体。在学校武

术教学训练中理应充分发挥武术教育最大价值尺度,使武术教育成为抑制校园欺凌现象的“灭火器”。然而,从现有文献看武术教育对校园欺凌现象产生助长还是抑制作用,尚未形成统一的研究结论。究其原因,研究认为武术具备强身健体功能,能帮助学生提升自我保护能力,从而有效应对遭遇校园欺凌行为。另一种观点认为,武术中包含技击元素,功夫片、谍战片等影视传播容易助长暴力倾向,致使武术成为助推欺凌行为的“催化剂”。本研究从多维视角审视武术教育对校园欺凌现象的助长抑或抑制作用,旨在为学校武术教育正名,引导学校武术更好地发挥以文化人、武以成人的教育价值,抑制校园欺凌现象,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一、教育学视角下武术教育对校园欺凌现象的审视

(一) 武术教育德技并施抑制校园欺凌现象

校园欺凌本质上是青少年道德人格发展失衡造成行为失范的一种外在表现,反映出个别青少年在群体生活中尊重、责任、共情等核心德性的缺失。从某种程度上说,校园欺凌现象频繁发生也是一种教育缺失的体现。因为教育关乎青少年道德养成和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武术教育作为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身体为载体,以实践为媒介的道德人格塑造工程,具有抑制校园欺凌现象的功能。具体而言,一方面学校武术具有丰富的德育元素。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影响下产生的武德,以重德崇武、自强礼敬、忠义仁和等信念影响着传武、习武、用武的道德规范。它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价值体系将儒家伦理与武学精神深度融合,形成了“崇德尚武”的独特育人逻辑。习武之人,崇尚武德,“不恃强凌弱”“不主动挑衅”等并非简单的行为规范,而是将武术的攻击性行为置于道德的框架之中进行审视和引导。武术德育就是从“武”的维度对人实施德的教化,讲究“武以德立,德为艺先”“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的道德境界追求。另一方面学校武术本身是一种身体与精神统一的运动,它能凝聚一个人的精、气、神,同时具有健身、强身、修身作用。例如,太极拳、散打等不同类型的武术课程在校园中有着独特的教育价值,有利于“野蛮其身体,文明其体魄”,对校园氛围的改善起到了显著作用。太极拳以柔和缓慢、行云流水的动作特点,强调身心合一、以意导气,在练习太极拳过程中,不仅能够锻炼身体的柔韧性、协调性和平衡能力,更能在宁静舒缓的练习氛围中,培养内心的平和与宁静,提升专注力和意志力。这种内心的修炼有助于学生在面对学习与生活中的压力时,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避免因情绪失控而引发冲突。散打课程侧重于实战对抗,注重培养学生的勇气、毅力和竞争意识,在散打训练中,学生通过公平竞争、尊重对手等规则要求,逐渐养成尊重他人、遵守规则的良好品德。同时,在克服训练困难和挑战的过程中,学生锤炼了自身的意志品质,增强了自信心和责任感。基于此,学校武术课程所带来的德技并重、身心共育的教育效果,为抑制校园欺凌现象营造了积极向上、和谐有序的氛围。

(二) 武术教育兼具黩武风险导致暴力行为泛化

自学校武术纳入学校体育课程体系以来,武术教育的体育化进程一直在加速演进,单纯的武术技术教学逐渐瓦解了武术完善的育人传统。无论是师徒传承方式,还是德育为先的传承理念都在遭受摒弃,使得学校武术现有教学体系与弘扬中华武德难以相辅相成。习练武术之人体悟知行合一、术道并进的道德教化越来越空泛。也因此在一些情况下习武青少年存在对尚武精神理解偏差、武术技术滥用、武德缺失等促使暴力行为泛化的现象。具身

认知理论认为,人的身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会塑造对事物的认知与理解,武术教学中的对抗性训练通过身体动作的反复强化,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形成攻击性行为的肌肉记忆与神经联结。在多种对抗性训练与实战中,学生在实战演练中通过观察教练的技击示范和同伴的对抗表现,可能建立“武力解决问题”的认知图式,若在教学中教练引导不当或缺乏引导,习武青少年思维认知中会存在误区,将会导致其错误的运用武术技艺,偏离武术教育的初衷。从另一个视角看,武术等级制度与竞赛体系构建的差序格局,在教育场域中可能异化为权力再生产的工具。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Field Theory)指出,个体的行为不仅仅是由个人的意愿和选择决定的,还受到场域中各种结构和力量的影响,武术段位制形成的文化资本分配可能强化校园既有的权力结构。当武术教育过度聚焦于技能训练,而忽视了武德的培育时,部分学生可能会将武术技能单纯地等同于绝对权力,他们会错误地认为,掌握了高超的武术技巧,就可以在校园中为所欲为,以武力解决一切问题。在这种错误观念的驱使下,这些学生可能会利用武术技能对其他同学进行欺凌,将武术从一种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的技艺,异化为一种欺凌他人的工具。这种新的“强者逻辑”的形成,不仅破坏了校园的和谐秩序,更严重违背了武术教育的初衷,加剧了校园权力关系的失衡和欺凌现象的泛滥。

二、心理学视角下武术教育对校园欺凌现象的审视

(一) 武术教育为被欺凌者心理赋能

研究表明,当个体在掌握某项运动或在某项运动中能够体验到超越自我的成就感时,其对身体的满意度也会增加,身体自尊水平就会提升。从身体教育角度出发,武术技艺教学可使受欺凌者上获得心理满足感,其对自己能够成功完成其他任务或目标的信心会有一定提升,即提高受欺凌者的自我效能感。武术教育中武术礼仪教学可通过独特的文化符号和行为规范,从多个维度促进受欺凌者自我认同的积极转变。在尊重与尊严感的塑造层面,武术礼仪中常见的鞠躬、敬礼等行为,绝非简单的形式主义,而是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鞠躬礼体现了对他人的敬重,在施与受的互动中,受欺凌者不再仅仅是处于被贬低、被忽视的被动地位,而是成为了礼仪行为的主动践行者和尊严的维护者。这

种身份的转变在心理层面上具有重要意义,受欺凌者在频繁参与此类礼仪活动后,逐渐内化“尊重他人即尊重自己”的观念,进而从心理上摆脱“被贬低者”的标签,重塑自身的尊严感和价值感,将自己视为一个值得被尊重的个体。

习练武术的经历可以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诸如帮助青少年改善内化心理问题和减少外化行为问题等。改善内化心理问题表现在减少焦虑、改善抑郁症状、提升自我控制力、自我概念、心理韧性、幸福感和自我效能感,减少外化行为问题体现在降低攻击性、增强执行功能、改善学校表现。武术教育礼仪中的“克己复礼”“点到为止”等规则,是对受欺凌者情绪管理和行为自控能力的深度训练。当受欺凌者在武术训练中遵循这些规则时,他们需要时刻保持对自身情绪和行为的觉察与控制。在对抗训练中,即使面对对手的强力进攻或挑衅,也必须克制冲动,严格按照规则进行应对,这种长期的训练使得受欺凌者逐渐掌握情绪调节的技巧,减少在面对欺凌情境时因恐惧、愤怒等情绪而产生的被动反应。通过对自身行为的有效控制,受欺凌者能够增强对所处情境的掌控感,进而在心理上构建起“我能应对”的积极自我认同,从以往面对欺凌时的无助状态中解脱出来,以更加自信和主动的姿态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二) 武术教育对欺凌者具有双向引导作用

欺凌行为源于个体内心的权力欲望与自我认同的危机。青少年在学业、家庭或社交领域遭遇挫折时,易引发权力欲望与自我认同危机,进而催生欺凌行为,以此获取掌控感与优越感,满足心理需求。对于欺凌者而言,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武力即权力”的错误认知,在接触到武术的道德规范后,反思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这种反思是对原有暴力价值观的冲击,促使他们重新思考力量背后所应承担的责任,使其对欺凌行为进行重新认知重构。武术训练中的规则意识和纪律要求,对欺凌者的心理可产生塑造作用。在武术训练中欺凌者需要严格遵守各种规则,如训练流程、动作规范等,这种规则约束能够让他们逐渐明白行为的边界,增强对社会规范的认同感。根据社会学习理论,个体通过观察和模仿他人在特定情境中的行为,并受到相应的奖励或惩罚,从而习得新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武术训练中的规则执行,为欺凌者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行为示范和反馈机制,有助于他们纠正不良

行为习惯,培养良好的行为自律性。

相反,如果武术课程过度强调身体对抗的教育价值,可能会强化欺凌者的攻击性人格倾向。在武术训练中对抗性的训练方式较为常见,这可能导致欺凌者将注意力过度集中在力量和攻击技巧上。心理学研究表明,长期暴露在具有攻击性的环境中,个体的攻击性认知和情绪会得到激活和强化。欺凌者可能会错误地将武术中的攻击性行为泛化到日常生活中,从而增加其实施欺凌行为的可能性。这种现象与攻击行为的社会学习理论密切相关,即个体通过观察和参与攻击行为,逐渐形成攻击性行为模式,并在类似情境中更容易表现出攻击性。另外,武术训练中的竞争元素,如果引导不当,也可能对欺凌者的心理产生负面影响。在竞争环境下,欺凌者可能会过度追求胜利和优势,从而产生过度的竞争意识和虚荣心。这种心理状态可能使他们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进一步强化其不良行为倾向。例如,在一些武术比赛中,如果过于强调胜负结果而忽视了比赛的参与意义和道德内涵,欺凌者可能会将比赛中的竞争模式错误地应用到与同学的相处中,加剧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

三、社会学视角下武术教育对校园欺凌现象的审视

(一) 武术教育作为干预手段抑制欺凌行为

武术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在传授武技的同时,也承载着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传递。武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载体,其蕴含的“尚武崇德”精神内核与“止戈为武”价值理念,通过课程化教学与仪式化活动,形成具有文化约束力的校园环境。这种文化场域的构建,通过集体意识的形塑与友善价值观的传播,将反欺凌规范内化为学生的道德自觉,从社会认知层面消解欺凌行为的合理性认知。通过武术训练,学生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还能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和内化诸如尊重、纪律、自律、坚韧等社会规范和道德价值观,这种规范和价值观的传递有助于培养学生良好品德和行为习惯,减少欺凌行为的发生。以武术中的抱拳礼为例,它代表着对他人的尊重和友好,学生在学习和实践中能够逐渐理解并运用这种礼仪,从而促进和谐的人际关系。

武术教育在社会规范如何内化和群体互动如何重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集体训练和参与,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遵守社会规则。武术训练过程对纪律和尊重规则具有严格要求,这种训练方

式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律性和责任感。例如,学生需要按时参加训练、遵守教练的指导,以及尊重其他学员。这些规则和纪律的遵守不仅在武术训练中体现,还可以延伸到日常生活中,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武术课程常以集体形式进行,在训练中,学生需要与同伴相互配合、相互支持,这种群体互动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社交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集体,减少孤独感和被排斥的感觉。根据社会生态系统相关理论可知,学生接触最多的同伴能够帮助建立起对班级和学校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使得学生积极参与学校生活。相反,如果一个学生找不到归属的群体,变成学校当中的边缘人,则其遭受校园欺凌的频率大大提高。在武术训练过程中彼此可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建立起良好的社交网络,在遇到困难时相互可提供支持和帮助,有利于增强其集体荣誉感和归属感。

(二) 武术教育群体排他性助长欺凌行为

武术文化源远流长,但当前大众受影视、游戏等文化作品的影响,对武术文化存在一定误解。许多人将武术片面地理解为一种夸张的表演或暴力打斗技巧,忽视了武术所蕴含的修身养性、品德培养以及文化传承等功能。其中“强者为尊”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武术对力量与能力的尊崇,但在校园中若这一价值观被片面强调,便可能出现被学生重构为校园权力符号的现象。掌握武术技能的学生,在“强者为尊”观念的影响下,可能会将武术技能作为彰显自身“力量”的工具,通过对其他同学实施欺凌行为,展示自己的体能优势与所谓的“强大”。在群体互动过程中,部分学生可能会基于对力量的错误认知,对这种欺凌行为表示认同,使得实施欺凌的学生在群体中获得地位提升与认同。这种现象违背了武术文化的本质精神,也对校园的安全与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危害,让暴力在错误的价值重构中获得了某种看似“合理”的存在空间。

依据科恩的亚文化理论,在与主导文化的互动中产生的具有独特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与符号系统被称为亚文化。与其类似,在校园武术环境下武术社团或训练群体易形成相对封闭的“亚文化圈层”。从共同的身体实践层面来看,武术中的各类招式是群体成员独特的行为表现方式,成员们通过反复练习特定的武术招式,不仅提升自身技能,更在这一过程中形成默契与归属感。与此同时,等级

制度也是强化内部认同的关键要素,武术中的段位、级别的划分,让成员清晰知晓自身在群体中的位置,这种层级结构激励成员不断进取,也进一步巩固了群体秩序。然而,这种内部凝聚的过程也可能滋生对“圈外人”的排斥甚至敌意。由于武术群体内部独特的文化与实践,使得他们与其他非武术群体在行为、认知上存在差异。当这种差异被放大,武术群体成员可能会将非本群体成员视为异类,从而产生排外心理,在极端的情况下,这种排外心理可能演变为群体性欺凌行为,对校园和谐环境造成破坏。

四、武术教育干预校园欺凌的实施路径

(一) 实施德技并重的武术课程教学模式,强化受教育者自控能力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武术教育与德智体美劳教育内容有着诸多的内在关系,是培养时代新人、抑制校园欺凌现象的重要课程。但当下学校武术课程教学无论从教学内容还是教学评价,都是基于技术训练娴熟为衡量标准,相关考核中较少涉及对武德品行的要求,致使学校武术教育的育人功能难以发挥培养“品行端正的人”的价值,以此来维护青少年群体和谐的人际关系。经过前面的分析因此提出实施德技并重的课程教学模式,强化受教育者自我控制能力干预校园欺凌现象的路径。武术教育需突破传统课程教学模式,通过技术训练与德行培育的协同发展,实现青少年身心的全面塑造。在武术技术教学中,以八段锦、太极拳、长拳等传统套路为核心载体,结合现代运动科学原理,通过重复性动作定型训练,如长拳中的马步桩功、太极拳中的揽雀尾等,强化学生的肌肉记忆与身体协调性,促进生长激素分泌,为肌肉和骨骼的发育提供支持,为青少年生理人格的稳定发展奠定基础,促使其形成稳定的身体控制力。根据神经科学研究,武术类具身训练可有效调节人体大脑的活动,有增强前额叶皮层的激活程度的功能,该区域作为大脑的“理性中枢”,其活跃度的提升有助于个体在面临冲突情境时,实现对冲动行为的有效抑制。在重拾武德培育课堂教育中,根据武术以“以德为先”“以德服人”的德性文化特色,在武术课程设计中加入“武德十诫”等传统伦理规范,并采用情境教学法,创设多样化的道德实践教学场景。通过讨论“面对

他人挑衅如何回应”等现实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培养青少年道德判断与决策能力;借助传统武礼实践,如抱拳礼等仪式化活动,以身体参与带动情感共鸣,促使学生在模仿与实践中实现道德认知的内化。这种“技术训练筑基、德行浸润赋能”的课堂教学模式,打破了传统武术教学重技能轻德育的局限,使武术教育真正成为提升学生自我约束能力与道德素养的重要途径。

(二)设计对抗与合作相结合的课堂教学情境,培育受教育者化解矛盾冲突智慧

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在体育竞赛中运动员通过对抗合作精神可以有效提高自身的价值。体育作为工具不仅能赢得竞赛的胜利、威望或奖赏,而且能塑造健全的人格。“和平之父”约翰·加尔通提出的冲突转化理论认为,冲突可以通过改变其性质、动态和认知过程创造积极结果并可建立可持续和平。在武术教育中通过设置对抗类实战教学,可以检验课堂训练效果,同时也不能忽视对学生进行赛事竞争中合作的思想引导。因为,对抗与合作就像教育价值发挥的“硬币的两面”,对抗教会受教育者预判冲突、理解规则的边界,合作有利于受教育者体会不同立场的感受、学会沟通。武术教育设计“三阶九步”情境教学,通过对抗与合作的动态转换,将武术训练转化为冲突化解能力的培养过程,从而实践培育受教育者化解冲突的智慧。例如在武术教育对抗阶段,采用限制性实战训练,如佩戴护具的推手较量、模拟攻防演练等,让学生在安全可控的冲突场景中,切身感受力量运用的边界与规则,理解攻击行为的后果与责任,提升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更能促使其形成对暴力的理性认知。进入过渡阶段,通过引入角色反转训练,要求学生分别扮演施暴者与被欺凌者,通过身份转换与情感代入,深刻体会不同立场的心理状态,从而有效提升学生共情的能力与换位思考意识。在合作阶段,则聚焦于团队协作,设计武术创编任务,如集体编排防身术套路、合作完成武术情景剧等,学生需通过协商动作序列、分配攻防角色,在共同创作中培养沟通协调与团队合作能力。通过对抗、过渡、合作三个阶段的有机衔接,学生得以在真实模拟的情境中,逐步掌握冲突预判、情绪疏导、非暴力沟通等冲突化解策略,实现从单纯肢体对抗到智慧博弈的认知升级,最终形成理性应对冲突的思维模式与行为习惯。

(三)打造个体与社群联动教育机制,重塑校园和谐文明生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学校、社区、家庭是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三个重要场所,三者形成协调共育的互动机制才能更好地培养人格健全的时代新人。武术教育的主要场所在学校,由学校辐射到校园周边及其家庭,形成学校主教、校园周边培训机构吸引更有兴趣的学生进一步提高和家庭关心、支持武术教育的互动机制更有利于遏制校园欺凌现象的出现,重塑校园文化生态。武术教育可依托个体、个体与个体及体与社群构建“五维同心圆”互动机制,通过个体、同伴、班级、学校、家庭社区五个层面的协同联动,推动武术教育从个体技能培养向校园文化生态建设延伸。在个体层面,通过武术段位制评价体系,为学生设立清晰的成长目标,通过阶段性的技能考核与认证,增强其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动力。同伴层面实施“武者伙伴”计划,选拔高段位学生担任新生指导,建立“一对一”或“多对一”的互助关系网,形成朋辈支持系统,促进学生间的良性互动与共同成长。班级层面以武术为主题开展系列班会活动,借助“叶问式”等经典武术人物的非暴力叙事,重构班级群体规范,弘扬尊重、包容、互助的价值观。学校层面设立武道文化节,通过集体武术展演、武术文化讲座、校际武术交流等活动,营造浓厚的武术文化氛围,强化学生的身份认同与集体归属感。家庭社区层面,组建家庭武术教育家长群、积极联动当地武馆、武术协会等资源,构建反欺凌支持联盟,拓展武术教育的社会支持网络,形成学校、家庭、社区三位一体的协同育人格局。这种多层次、多维度的联动机制,不仅优化了校园社交网络结构,促进学生群体关系的和谐发展,更在校园内外形成预防欺凌的系统性屏障,推动武术教育从单一的行为矫正功能,向塑造积极文化生态的更高目标推进,为和谐校园建设提供可持续的动力支持。

五、结语

校园欺凌是多种社会问题交织形成的复杂现象,其治理需要突破单向度的应对思维,回归教育本源的育人逻辑。武术教育对校园欺凌的介入作用呈现多面性,应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揭示其“以武育德”功能对抑制校园欺凌的积极意义,同时指出其潜在的黠武风险、心理引导双向性及群体排他性问题。据此,提出德技并重、对抗合作结合、个

体社群联动的优化干预路径,强化受教育者自我控制能力、培育化解冲突智慧、重塑校园和谐文明生态,充分发挥武术教育的积极效能,为有效抑制校园欺凌现象,促进校园安全与和谐发展提供新思路。未来,需在实践中持续探索与完善,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推动校园欺凌干预工作迈向新高度。

参考文献:

- [1]郭丽婷.我国低龄未成年人校园欺凌的法律规制——以大同市未成年人欺凌事件为切入点[J].青少年法治教育,2024(6):10-16.
- [2]赵雪佚,马秀杰,唐双双,曾浩.以武化人:新时代中华武术具身教育对青少年人格培养的研究[J].体育科学,2025(2):46-56.
- [3]王巍堡,杨豆豆,康涛.论传统武术教育中的文化冲突[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21,41(6):70-74.
- [4]刘佳佳.“健康中国”背景下武术文化在校园传承价值研究[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22,38(4):59-61.
- [5]叶松东,贾晨,Koh Koon Teck.具身德育视域下学校体育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学理阐释、实践困境与推进路径[J].体育学刊,2024,31(6):8-16.
- [6]刘转青,殷治国,郭军,等.我国体育社会组织主体性缺失的场域理论解析[J].体育学刊,2018,25(4):14-20.

[7]吴庆良,付佳浩,樊碧远.体育锻炼防治校园欺凌的内生逻辑与路径探析[J].青少年体育,2023(12):56-59.

[8]张紫凌.基于社会心理学的校园霸凌成因及干预对策[J].心理学进展,2023,13(9):3623-3628.

[9]郭燕兰,刘映海,韩建阳.武术习练经历与初中生被欺凌风险:心理韧性和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作用[J].体育与科学,2024(5):85-93.

[10]张云斌,杨艺,于敏章.中小校园欺凌行为矫治的现实困境与实践理路[J/OL].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25-3-6.

[11]叶宝娟,杨雪,陈传升,等.大学生受欺负与攻击行为的关系:相对剥夺感的中介作用和日常环境中的暴力暴露的调节作用[J].心理科学,2021,44(2):309-315.

[12]段东园,张学民,魏柳青,等.暴力媒体接触程度对攻击行为的影响——规范信念和移情的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4,30(2):185-192.

[13]许钊钊.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下的校园欺凌影响因素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22.

[14]张敏,孟繁荫.流变中的恒定:同人亚文化群体的身份认同与意义建构[J].青年学报,2024(2):83-94.

[15]赵歆,龙行年,彭小伟,吴雪琴,李成.高校武术课程思政的育人内涵、面临问题与推进策略[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2(8):68-74.

[16]常健,张晓燕.冲突转化理论及其对公共领域冲突的适用性[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14(4):46-56.

Fostering or Suppressing: A Multidimensional Examination of Martial Arts Education in the Phenomenon of Campus Bullying

XIANG Chun-yan, ZHU Xiong

(Wushu College, Wuhan Sports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China)

Abstract: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tervening role of martial arts education in school bullying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such as pedagogy,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and proposes optimized intervention paths. The study finds that in school education, the function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through martial arts” in martial arts courses can inhibit the occurrence of school bullying. However, martial arts education also has the risk of militarism, which may lead to the generalization of violent behaviors. At the psychological level, martial arts education empowers the bullied psychologically, but it has a two-way guiding effect on the bullies. From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martial arts education, as an intervention measure, can inhibit school bullying behaviors, but the exclusivity of the martial arts education group may fuel bullying behaviors. Finally, three intervention paths for martial arts education to optimize the phenomenon of school bullying are proposed: implementing a teaching mode of martial arts courses that attaches equal importance to morality and skills to strengthen the self-control ability of the educated; designing classroom teaching situations that combine confrontation and cooperation to cultivate the wisdom of the educated in resolving conflicts; and creating an educational interaction mechanism that links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to reshap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campus culture.

Key words: teenagers; martial arts education; campus bullying; multidimensional examination